

“蠡山体”与“少陵体”、“长庆体”

——桐城派先驱方文诗歌论

朱丽霞

摘要:在清初尊杜黜白的诗学思潮中,桐城遗民方文的诗不仅受到少陵体的影响,也在极大程度上接续了长庆体的特色,从而形成与梅村体、虞山体同辉于清初诗坛的蠡山体。蠡山体在三个方面受到少陵体、长庆体的影响:一、继承少陵体、长庆体关注民生、为民歌哭的诗思。二、继承少陵体、长庆体的叙事传统,以史笔诗语记录一段动荡而真实的历史。三、追求质朴、平实的语言风格。蠡山体不但在清初诗坛独具一格,而且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清代诗坛,成为桐城派的先驱。

关键词:方文;蠡山体;少陵体;长庆体;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4)01-006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ZW044)

作者简介:朱丽霞,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上海 200000)。

蠡山体^①是明末清初桐城遗民方文^②个性诗体的特称。当时,遗民阎尔梅即已发现方文创作的独特个性“杜陵天宝之诗人,香山变为长庆体。迨有明兮千余年,桐城掘生方尔止。”^③准确地说明了蠡山体的艺术渊源——直追杜少陵、白香山,而且成为杜陵、香山之后终生关注现实的卓越诗人。方文自己表示作诗“以杜、白为第宅”^④,一生“沉酣杜、白”^⑤。他曾自比于陶潜、杜甫、白居易,并因与这三位前贤同生“壬子”之年而“命画师绘《四王子图》,中为陶渊明,次杜子美,次白乐天,皆高坐,而已伛偻于前,呈其诗卷”^⑥。“伛偻”于诗贤面前,表示对他们诗学成就的无限敬仰。

他坚信:这些文学经典人物将引领他的诗思到达理想的高度。因而孙枝蔚《题方尔止四王子图》评曰“但愿论文遇陶叟,更招杜白坐两边。”^⑦这意味着孙枝蔚能够理解方文异常的个性禀赋与才学抱负:陶叟、少陵、乐天其实就是方文想要并驾齐驱的真正目标,希望自己的诗歌不但垂世,而且能够“与少陵、香山诸贤争千古”^⑧。可以感知,方文所意识到的强大的文化使命:在经营文化传统的事业中,他将自己定位于文化承继者与传播者的角色。他所苦心期盼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不仅能够被未来的世代所认同,而且对诗坛后辈产生像三贤一样的价值导向。

^① 潘江《王子安节以蠡山续集见贻即效蠡山体赋以志感》,《蠡山集·徐杭游草》所附。又,李雅则称为“尔止体”:《程松皋方东来饷金刻集犹吴锦雯之捐刻方尔止诗也作此谢之即仿尔止体》,见《龙眠风雅续集》卷15,《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53页。

^②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号蠡山,原名孔文,字尔识,明亡后更名一耒,别号淮西山人、明农、忍冬,桐城人,方大铤长子。明末诸生,入清不仕,游食、卖卜、行医或授徒为生,多与复社、几社名士交往,以气节相砥砺。早年与钱澄之齐名,后与方贞观、方世举并称“桐城三诗人”,著有《蠡山集》。

^③ 阎尔梅《白昼山人诗集·题方尔止四王子图》卷4,《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

^④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56页。

^⑤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⑥ 王士禛《渔洋诗话》,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

^⑦ 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00页。

^⑧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2页。

方文自言其作诗途径曰“有唐诗人累千百,我独师承杜与白。”^①他从杜甫与白居易那里所师承的首先是对现实的热切关注。文学不仅要泄导人情,且要宣教社会。

经历安史之乱的杜甫,他的诗既是时代盛衰的忠实书写,亦是他飘零身世的完整自传。作为时代苦难的见证,杜诗被后世奉为“诗史”。而最可敬者乃是他颠沛流离之际,仍忧国忧民,其独特的抒写风格后世称为“少陵体”。此后,少陵体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诗史的“正宗”,而杜甫亦被后世尊为“诗圣”,成为古典文人的精神化身和心灵寄托。在这一层面,白居易最为折服杜甫,杜甫亦在白居易的时代第一次被推向诗坛的巅峰。而白居易也正是尊崇少陵而创作出影响同样深远的“长庆体”。

从诗思层面看,所谓少陵体、长庆体,首先在于对国运的焦虑、对现实的关注,而这种忧国忧民的焦虑多运用乐府诗进行描述。从汉代到唐代李白,乐府诗体始终沿袭古题,即使偶有自立新题者,亦多吟咏古事。自杜甫始,这一古老传统才被打破,用新题写时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杜甫的乐府诗标志着乐府体新时期的到来。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诗歌运动直接高扬杜诗旗纛。“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其新乐府诗歌即以杜诗的风雅比兴作为诗学航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将诗歌作为救治社会之弊的利器。由此,唐人张为撰《诗人主客图》,评价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4)论及唐诗云“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亦将白居易作为儒家的宣教使者。为苍生歌与哭正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体现,亦是文人所应具备的社会责任。儒家大济天下、苍生为怀的理想,少陵、香山,坚信躬行,作为诗人的典范,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最高贵的品质,这正是他们的人格感天动地的原因,也是他们的诗为后世所颂扬的因由。“伤心国破家

何在,俯仰之间迹已陈。”^②以忠君怀国为旨的龠山诗,正与少陵、香山一脉相承。

经历改朝换代、国破家亡的方文,不仕新朝。誓为遗民,颠沛流离,靠游食、卖卜、授徒为生,“负笈行游,千里命驾,历齐鲁吴越燕赵中州之墟,其所经阅,山川伟丽,云树苍茫,风物之变迁,贤豪之晋接,羁人思妇之愁叹,酒徒剑客之慷慨,有慨于中,一皆于诗发之”^③。“以其羁孤落拓之身、忠孝壮烈之性,遇友朋而缠绵,遇山川而慨叹。”^④他的诗成为动荡年代飘零身世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成为大地沧桑后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这份“日记”逐渐地将他着怀故国的情操展示出来。他认为,让后人知道并了解过去的历史是自己的诗学天职。《除夕咏怀》(1644)(其一)云“藏书遍写崇祯字,每岁开函泪满裾。”^⑤尽管年年除夕,先皇日历亦已更新,为解故国伤痛,无数遍题写“崇祯”二字。在方文的意识中,“崇祯”非复消逝的王朝,而是一种逝去的文化象征。每年三月十九日,方文都会举办纪念仪式,追怀殉国皇帝。“龠山体”创作正是方文为胜朝存史的艺术追求。“侧身天地几人在,举目河山万事非。”^⑥身经战乱,龠山诗所关切者乃动乱中的苍生苦难。在这一点上,龠山体与少陵体、长庆体异曲同工,国家民族兴亡融于诗人自我的哀乐之中,建构起诗思中沉重的国事焦虑和生民忧患。杜甫尝言没饭不忘君,白居易则“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与元九书》),少陵体、长庆体由于所达到的道德高度而成为后世理想的诗学典范。透过龠山诗,可以看出,尽管经历奔波,艰辛劳顿,方文却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人格完全独立的诗人。

“代马萧萧鸣过江,江东无地不倾降。”^⑦清兵的迅速南下,南都未及抵抗便举城投降,故国王朝顷刻间分崩离析、湮没消溟。胜国大臣当年忠君报国的壮志豪情在大地上都已烟消云散。目睹所谓“忠臣义士”在国破时日非忠非义之举,方文伤心问天:“却怪两京齐改步,曾无一士肯捐生。”^⑧三百年朝廷养士,众官员荷国旧恩。但国难当头之际,却无一人甘作忠臣。国变之初(1645),方文回到金陵,旧京所见,冠盖满衢,“乘轩争乞新朝宠,对酒都忘故主恩”^⑨。“旧京宫阙已

①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41页。

②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83页。

③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11页。

④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2页。

⑤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79页。

⑥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83页。

⑦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85页。

⑧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84页。

⑨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79页。

成尘,宝马雕鞍日日新”^①。令人震惊的是,前朝命官都在汲汲于争取新朝新职位,谋取新权势。“万劫不烧唯富贵”^②,眼下个人的富贵荣华远远重于共有的江山社稷。“五伦最假是君臣”^③,如父如子的君臣关系虚假到不堪一击。所谓君为臣纲,当这一信条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君临臣下的权威便会荡然无存。这使得方文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沉重的君国之责:不仅将改朝换代的事件记载下来,而且要让他透过他的诗得知历史真相。尤其重要的是,尽己所能将前朝的文化传承下去,使得后世子孙勿染异族野蛮落后的“腥膻”之气。

行医占卜卖文,苦难的经历孕育了诗思与文意。“流水滔滔何日返,遗民落落几人存”^④。江山换代,岁月蹉跎。易代之初,那些相约首阳采薇的众遗民不堪忍受薇蕨采光的凄凉纷纷投奔新朝,谋求新朝“国粮”,知音渐稀。目睹“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场景,方文更感到自己坚守的重要和对将来会产生的道德意义。他希望透过诗篇寄托其孤愤的心迹和让后人明了其誓为“野人”的苦衷。“空囊莫问金多少,但有《蠡山集》一函”^⑤。他将自己的《蠡山集》等价于南宋遗民郑思肖《铁函心史》。《心史》作为记录宋朝失国之痛的历史奇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在苏州承天寺簪井底被发现,得以重见天日。作者郑思肖,南宋末为太学上舍,曾应试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上疏直谏,痛陈抗敌之策,被拒不纳。郑思肖痛心疾首,孤身隐居苏州著痛史。四百年后,方文重历郑思肖的苦难,他意识到自己所负忠孝责任的重大。方文深信,后人将通过文字得知这段悲怆历史。“世间何物夺吾好,异代有人知此心。”^⑥渴望为后世所理解,让后人了解故朝文明,正是鼓动方文创作的力量。而对国家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也正是杜甫、香山创作的精神动力。在这一点上,杜、白自然成为方文释放心灵之苦的知音。

以遗民创作为中心,清初诗坛,普遍宗杜而黜白。推扬少陵成为虞山、云间、太仓等众多文学流派、众多诗人共同的诗学方向。虞山宗杜在于揭橥宋调,云间宗杜旨在鼓吹唐音,其动机都在于树立一种新的诗学典范,是文体学意义上的宗杜。方文亦是宗杜洪流的推波助澜者,而他的宗杜则突破文体学视野而从文化影响力的角度推宗杜甫,钱谦益《送方尔止序》谓易代丧乱以来,诗垒日盛,独方文诗“得少陵之风骨,深知其(杜甫)阡陌者,一人而已”^⑦。方文宗杜乃站立在文化的高度,而非仅仅倡导一种诗学观念,因此钱谦益即读懂了方文的诗思,谓其“迥绝时流”^⑧。更为可贵的是,清初诗坛“多薄视香山,而尔止酷好之”^⑨。“世人尊杜或嗤白,蠡山大笑看青天”^⑩。方文认为,香山诗与少陵诗具有同样的社会价值,为香山诗的遭遇冷落鸣不平,由此,方文特别将众诗派所摒弃的香山诗提高到与少陵体并举的地位。“诗似杜陵推史笔”^⑪、“尤喜唐时白乐天”^⑫,将少陵、香山作为自己诗学的两座目标。不仅如此,方文还有意识地推举香山,往往“香山集向肘边摊”^⑬,所到之处,“遍题白香山”^⑭。香山诗成为方文随身携带不可或缺甚至消忧解闷的精神伴侣,“消愁唯有香山集,夜夜灯前当酒杯”^⑮。在发扬古典道统、继承传播儒家雅音方面,少陵、香山都堪称后世诗学的榜样,杜、白诗的忠厚之旨正是儒学传统的生命得以延续的精神动力。此外,诗史上,没有谁能够负得起这份厚重的文化使命。因此,方文将自己视为杜、白诗忠实的传承者,“诗亦前贤杜白诗”^⑯。推尊杜、白,尤其是对于杜甫的推扬,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桐城派。方文成功的创作实践实为桐城派的诞生起到了导夫先路之功用。

方文一生酷嗜诗篇,他用诗歌诠释自己的行为,

- ①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82页。
- ②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82页。
- ③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82页。
- ④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80页。
- ⑤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99页。
- ⑥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96页。
- ⑦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905页。
- ⑧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1356页。
- ⑨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0页。
- ⑩ 孙枝蔚《溉堂前集》,第22页。
- ⑪ 《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9册,第202页。
- ⑫ 潘江《木厓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2册,第92页。
- ⑬ 《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9册,第601页。
- ⑭ 《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9册,第34页。
- ⑮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07页。
- ⑯ 潘江《木厓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2册,第176页。

“妻孥莫恨无生产,千首诗传抵万金”^①。他深信,尽管生前困顿,但自己的诗名将流传后世。在社会道德教化方面,“蠡山”体现了少陵体、长庆体的诗史进程。由此左国榘于《题方明农采药图》中称方文为清初“三十年来风教主”^②。

二

邹祗谟《题丙午诗》(一)论及方文写诗的独特诗径曰“悬知杜老是前身,待与香山作后尘。”^③这一评论不仅包含了蠡山诗在思想内容方面对少陵、香山诗的接纳,同时也点明了对其艺术学养的吸收。而蠡山诗艺术上近于杜、白者最明显的即歌行体的叙事方式。李明睿为方文《徐杭游草》作《序》即感于蠡山体的特色而“拈出序事一说,以为诗家之标准”^④。

张其淦《明千遗民诗咏》卷2谓“蠡山亦诗史。”这是“蠡山体”引人注目的艺术特点。《蠡山集》是方文以自己的见闻所建构的一部在野的“晚明史”,从中见证了人民的苦难与时代创伤。“铺陈杜老诗中史,曲折睢阳传后题”^⑤。梁公狄喻方文《述哀》为少陵“北征篇”^⑥。方文无疑已成就了一份史家笔触。杜甫以前,叙时事之作较少,杜甫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叙事精神,将历史诗化,开创了诗歌传统中的“时事诗”。其近乎史笔的叙事传统被后世称为少陵体。其后,元稹、白居易接受了杜诗的叙事传统。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因其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被称为长庆体。少陵体、长庆体在艺术方面的贡献即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诗歌的叙事功能,对后世诗史影响最大的即是其叙事传统,二者“虽气格声响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⑦。其后多少诗家对此兴叹难逾。清初诗坛上,出现了吴梅村、钱谦益等一批有诗史之称的诗人,并以各自的独立一体(“梅村体”、“虞山体”)相互辉映。“蠡山体”诗史在叙事诗的传承嬗变中,形成了自己的叙事视域与艺术特色。

李明睿谓方文诗“长于序事”^⑧。以诗的形式记录历史人物和事件,通过普通人的生存状况揭示社会的时运悲剧。这些历史事件的变化过程和历史人物一生的行迹在诗中得到真实可靠的记载,历史学家也往往

把它当作可信的史料。而这也正是杜诗与白诗引人注目之处。《蠡山诗》就是一部明清易代的苦难史。《负版行》(1657)似乎是方文的“日记”。事件来自于方文的一次途中所遇:路过金陵,看到一群人在焚烧某物,好奇探问,得知烧毁的是前朝账簿。方文深为震动,新朝政府就用这种方式毁灭一段历史,毁灭一段文明。兴亡盛衰,作为一首史诗,由一个细节映照出历史沧桑,焚烧明朝账簿证明了一个王朝的永远消逝,其深远的用意表明方文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异族统治的否定。透过一个生活细节反映历史的命运,它使诗的叙事性加强的同时,也增强了社会批判的深度,这是少陵体、长庆体叙事特色在方诗中的突出表现。《阿狗行》择取了跟随自己三十余年为人忠实的仆人阿狗被迫离去的一个场面——由于穷困,不得不卖掉阿狗。从临行的场面气氛开始写起,诠释了阿狗的真诚朴实和忠厚,及最后自己不得不忍痛割爱的缘由。仅以八十文钱即将一个吃苦耐劳的老仆人卖掉,方文怎能不为之心碎。易代动荡之际,对一个清醒的文化人来说,可值得写的素材非常多,但方文却选择了焚烧账簿和被迫卖仆两个细节,反映了对历史动荡的震撼。明清之际的知名文人中,很少有诗人把历史更迭的真面目写得如此深刻感人,而且把求生的一面刻画得如此细腻,扣人心弦。《大明湖歌》以凄怆之笔描绘了清兵入关横扫山东、屠城济南的残酷和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桐城人张秉文全家殉难的悲壮。济南守兵全军覆没,张秉文妻殉夫殉国,一妾为保全张氏之后而匿身草丛。清兵掠城而去后,此妾历经艰辛寻尸殓殓,扶柩归里,终于保全了张公的香火血脉。一整段连绵的历史创痕,宣酒成一曲时代转换时对告祭牺牲者的安魂之歌。钱谦益读后感慨不已“诵君历下诗惨凄,阴风怪雨生尺蹄。”^⑨可以感受到诗人抑制不住的悲恸:面对历史巨变时,那不可换回的沮丧和锥心刺骨的哀伤。可以看出,方文旨在“存史”,诗歌具有极强的纪实性,据此,我们可以“因诗以考史,援史而证诗”^⑩。《大明湖歌》将杜、白歌行体叙事传统,推向更成熟、更让人低徊痛思的境界。方文从杜、白诗取为鉴者,乃以诗叙写个人苦难的叙述

①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96页。

② 《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9册,第497页。

③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11页。

④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57页。

⑤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603页。

⑥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8页。

⑦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3页。

⑧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96页。

⑨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603页。

⑩ 赵翼《瓯北诗话》,郭绍虞主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89页。

策略和艺术技巧。诗心贯穿于史迹,蠡山体这种客观而不夸大的叙述视角,触发起后人绵延不断的黍离之悲,催人心折。在这些史诗中,历史的框架只是方文抒写哀乐的依托,史思成为牵引方文诗思的原动力。同时也可看出,方文自视的诗歌使命,乃希望后世读者,展读其诗之际,透过文字窥知其诗旨。

此外,读蠡山诗,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同时代的历史事件对他的影响,远比对其同时代的诗人如吴梅村、钱谦益、陈维崧等的影响要强烈得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上述著名诗人所遭遇的仅是国破而家未亡。即使那位著名的遗民顾炎武,虽然遭遇国破家难,但他变卖家产而远走北方谋求生路,手中仍有大笔资金,其生活不存在经济危机。而方文则不同,他不仅经历国破,而且桐城的家产被侵夺瓜分,易代后,他一无所有。因而,方文对于动荡的感受即非他人所能理解。痛彻、深刻、沉重。其诗中所“恨”远较吴梅村、钱谦益诸诗人沉痛得多。没有什么比《大明湖歌》、《阿狗行》、《大象赋》等系列歌行更鲜明、更直接地表明方文对历史的洞见了。这些史诗层层剥开了一个王朝悲剧性地走向毁灭的过程——人物和事件都以悲剧告终,而方文始终不渝地作为一个置身其中的经历者,记录和铭刻下一个逝去王朝的踪迹。借助于叙事,他试图记录一段将来出于各种原因会被遗忘的历史。尽管方文作为前朝遗民自置于易代动乱的文化边缘,但作为诗人,他做到了对自己信仰的持守,这就是方文“苟活”下来的动机和意义。

蠡山体“波澜独老成”^①,以其连绵不尽的诗思容纳了杜诗“沉郁顿挫”和白居易的“哀感悲情”,由此遗民沈寿民谓方文与“千年白傅风流后先”^②。遗民情结使蠡山诗包含了史笔与诗歌两类文体特点,史家之实录和诗人之悲愤融合为一,使得后人真切地聆听到一位遗民真正的“声音”,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将是“就使吴儿心木石,也应一读一缠绵”^③。

三

王泽弘《北游草序》谓方文“诸诗渐老渐熟,渐造

平淡。正如少陵夔州以后、香山洛阳、东坡海外之作,天机烂漫,几于神化”^④。所言即蠡山诗的语言特质:平淡质朴,天然独成。钱陆灿评蠡山这种独特诗风曰:“陶公冲淡杜公雄,白傅天然造化工。此笔千年谁伯仲,还将半格问方公。”^⑤认为唐以后的千年诗史中,真正地堪与陶潜、少陵、香山相伯仲的只有方文。这说明,蠡山诗不仅内容情感上接纳杜、白的忠爱仁厚,叙述模式上继承杜、白叙事史家传统,而且语言风格上依然以杜、白“朴老真至”^⑥为宗。蠡山诗全方位地尊崇杜、白而成“一家之诗”^⑦。

从诗学常规看,无论宗少陵、宗香山,还是宗陶潜,都是普遍认同的学诗正途。陶潜平淡,少陵沉郁,香山浅俗,三贤分别站立在三个高山之巅,足令后人仰望而难及。其中,无论效法谁,只要能够得其一体,即可视为学诗的成功。少陵沉郁与香山浅俗往往难以融合交汇,方文却能十分得体地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诗风进行整合,形成独具的蠡山体。周亮工也认为蠡山诗在融合杜、白方面非常成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于杜之雄浑,开阖顿挫,自为一气”^⑧。

透过方文的诗学观念,我们不难看出其以少陵、香山自居的气魄:不是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作为理论来演绎,而是以具体的创作加以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蠡山诗的淡与朴不仅能够并比香山,而且大有超越之势。邹祗谟说“君诗字字到空灵,易解宁烦老姬听。”^⑨白居易创作新乐府,诗成后,尚且要老姬听懂才肯罢休。而方文诗浑然天成,勿需经老姬检验。蠡山诗清水芙蓉的特色除了与少陵、香山共有的摒弃典故外,大量运用谚语、口语,亦其显著特点。施闰章《西江游草序》即谓蠡山诗“虽民谣里谚、途巷琐事,皆可引用,兴会所属,冲口成篇”^⑩。金天翮《皖志·列传稿》(卷2)亦特别评价方文诗歌的语言“诗任性灵,虽民谣里谚、途巷琐事,皆摭供诗材。”蠡山推崇长庆诗,但洗却铅华。徐芳谓方文诗“淡朴真至,居然一香

①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1356页。

② 沈寿民《复方尔止·姑山遗集》卷25,《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9册,第281页。

③ 袁枚《袁枚全集·小仓山房诗集·仿元遗山论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95页。

④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34页。

⑤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11页。

⑥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页。

⑦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34页。

⑧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3页。

⑨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11页。

⑩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0页。

山”^①,以至于有“人或以为率易”^②。事实上,龠山语恰如乐天,并非率易,而是非一日之积所达到的真与纯,读其诗无可解而卒不可到。所以邹祗谟谓龠山诗“平淡皆从攻苦得”^③。施闰章分析龠山诗“平淡”的缘由“不知其惨淡经营,一字未安,苦吟一移日。”^④正由于其作诗的严谨,龠山诗才能“真至浑融,从肺腑中流出,绝无斧凿之痕。”^⑤沉吟三复才能清真如话,其耐人寻味的平“淡”蕴含着挥之不去的深度伤痛,负载着深沉的思索,说明他借助于古典建立一种标准审美范式的成功。因此,越到晚年,他越执着于诗风的平淡。纪映钟为方文《徐杭游草》题词谓龠山诗“以大雅为宗,以自然为妙,一切纤巧华靡破裂字句,从不泚其笔端,垂三十年,守其学不变”朴实的诗风始终如一。吴梅村创作歌行体,完全承袭了唐代歌行的华丽典雅与辞藻富赡。而龠山诗与梅村体一样寓深沉于感慨之中,然洗退了长庆体、梅村体的“顽艳”,固守平实朴素,在清初诗坛确为另类。正是这种朴实的语言成为龠山体的明显特征。

方文“一生得意是诗成”^⑥,龠山诗在当世即产生了极大影响,吴兆骞、陈维崧即视“龠山诗”为圭宝。至迟到康熙初,龠山诗已以其“自成一家”^⑦的特色传遍大江南北,而且直接影响了清代诗坛,其最明显的例证即启导了桐城诗学的形成。

桐城派作为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几乎与有清一朝相始终,虽然桐城派以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名世,但其诗学成就同样引人注目。清末安徽绩溪人程秉钊在《国朝名人集题辞》中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的论断,认为桐城诗与文的成就难比高下。桐城诗派实际上即是宗宋诗派,而宋诗派的诗学即宗法少陵与香山。桐城诗派坚持儒家正统,重视人品学养,强调道德气节的主张,以及崇尚平淡易读、温柔敦厚的艺术要求都可在《龠山集》中找到明确的答案。潘江《跋龠山续集后》:“有明著作最权奇,熙甫文章尔止诗。”^⑧“熙甫”乃昆山归有光字。潘江认为,归有光散文与方文诗歌才真正称得

上明代文坛的“权奇”之作。所谓“权奇”乃指诗文中所包蕴的激情足以鼓动人心。归有光创作了大量关怀国运世情的经世之文,他以古文为手段,褒贬时事,宣传经国济世的人生理想。在这一层面,龠山诗与熙甫文异曲同工,归文与方诗拥有相同的文化品格。作为地域文学的明显标志,龠山诗成为后期的桐城诗的先导。

金天翮《皖志·列传稿》(卷2)论明季文士,以气节相尚,“江北人物,首推桐城,桐城以方氏为魁。而文与其从子以智,尤声振天下。”明清之际,方氏家族中方文、方以智、方拱乾联袂并举,鼎足于桐城文坛,开启一代诗风。他们的诗关注社会民生,“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⑨,同被后世视为“诗史”。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方苞之父方仲舒(1638—1707)即方文的诗学挚友,多有唱和。然而,在桐城派的研究中,学界通常认为方以智、钱澄之是桐城派先驱,方文则往往被忽略。并非方文诗文成就逊色时流,而是文学史缺少对他应有的关注。固然,方以智、钱澄之以对古文的实践开拓为桐城派作了成功示范,使读者目明心开。尤其是方苞,自幼受父辈影响致力写诗,学界之所以形成了“方苞不作诗”的误解,在于方苞在《麴青山人诗序》中“苞用是(指尊父教)遂绝意于诗”^⑩的率意记载。为此,刘文彬著《论“方苞不作诗”》(发表于《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已经证明了方苞不仅终身未“弃”诗,而且一直未曾止笔,且该文详细论证了方苞诗歌的主题即关怀国计民生,与其古文精神一脉相承。而这正是方文一生捍卫的诗学追求。只是方苞出生(1668)的次年(1669)方文辞世,方苞所受方文的影响间接来自与方文密切交往的父亲方仲舒以及方以智等。方文不但与方仲舒、方以智往来唱和,而且后与方贞观、方世举并誉为桐城三诗家,可以说,桐城望族方氏不仅是桐城派在清代星火燎原的见证者,而且是这一文学流派的直接起航者。另外,方文与钱澄之齐名,学界都注意到钱澄之对桐城派的影响并有专文论

①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1页。

②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0页。

③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11页。

④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0页。

⑤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90页。

⑥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85页。

⑦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页。

⑧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09页。

⑨ 方文《龠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259页。

⑩ 方苞《方苞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述^①,但钱澄之与方文则是臭味相投的诗学挚友,钱澄之《田间文集》卷4《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即因不敢苟同钱谦益杜诗说,而专门与方文进行讨论。不幸的是,方文因极少创作古文,而其对桐城派影响的诗歌也被忽略了。后世学界对《蠡山集》缺少关注,导致了人们对方文的学术冷落。事实上,桐城派作为影响至巨的地域文学流派,其最终形成波澜是一批具有相同诗学主张及近似生活经历的桐城文人共同参与打造的,绝非从天而降。

方文执着于自己认定的“林中路”,并且走出了一

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蠡山诗以自成一体的成就在清初不仅与“梅村体”、“虞山体”并驾齐驱,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在浩渺的学术史上,蠡山体尽管最终只能是一掠而过的雁影,但在其后,却终于“人过留声”。“蠡山三十年,晦明风雨,山水友朋,朝斯夕斯,饮食燕乐于斯,幽愁患难于斯”^②。借助于诗歌,他进入了文学史的经典行列。由此,方文被钱谦益定位于清初诗坛之“国手”^③。而“蠡山体”不仅体现了遗民方文的诗学思想,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诗学的发展与递嬗。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shan Style , Shaoling Style and Changqing Style

——On the Poetry of Fang Wen as a Forerunner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ZHU Li - xia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Du Fu was followed while Li Bai was rejected. The poetry of Fang Wen , a survivor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 wa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Shaoling style but also inherited the features of Changqing style to a great extent. Fang Wen's style of writing was called Tushan style , in competition with Meicun style and Yushan styl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ushan style was influenced by Shaoling style and Changqing styl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 it inherited the poetic idea of Shaoling and Changqing styles to care about the life of the people and to lament for them. Second , it inherited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Shaoling and Changqing styles , recording a turbulent but real history with a poetic style. Third , it pursues a simple and plain linguistic style. Tushan style possessed unique poetic feature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directly influenced later poetic development and became the forerunner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Key words: Fang Wen; Tushan style; Shaoling style; Changqing style; Tongcheng School

ZHU Li - xia , Ph. D. supervisor & professor , School of Humanities ,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000.

责任编辑:刘云

^① 见张瑞杰《论钱澄之对桐城派的影响》,《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周兴陆《桐城亦有诗派》,《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② 方文《蠡山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0册,第159页。

^③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第542页。